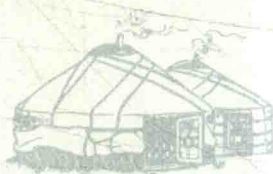




丁
燕
著

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
蒙古族生态文学的影响



科学出版社

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蒙古族 生态文学的影响

丁 燕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蒙古族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过数次与他国文学的碰撞与交融,借鉴外来经验是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新时期涌现出一批从事生态题材创作的蒙古族作家,他们从西方现代文学中所汲取的艺术技巧为蒙古族文学输入了新的特质。本书综合运用影响关系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以西方现代文学与蒙古族生态文学的“事实关联”为依据,从“文学性”出发,系统地比较研究郭雪波、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海勒根那、阿古拉泰等蒙古族生态作家对海明威、西顿、惠特曼等作家作品的写作风格、思想内涵、文学意象、人物形象、叙事手法等文学要素的借鉴、转化和吸收,以此为基础揭示西方现代文学对蒙古族生态文学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的影响 / 丁燕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03-052475-1

I. ①西… II. ①丁… III. ①外国文学-影响-蒙古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6804 号

责任编辑: 王洪秀 冯晓寅 / 责任校对: 李 影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字数: 230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3CWW014）成果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内蒙古科技大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专项（项目号：2015QNKG06）成果

内蒙古科技大学重点教改项目（项目号：JY2016018）成果

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文学阐释

包斯钦*

丁燕的新著《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的影响》将要出版了。年前，她把书稿寄给我，问我能否给写个小序，于是我抽空读起她这部著作，很快被作者抽丝剥茧、丝丝入扣的分析研究所折服，也被她心无旁骛、披沙拣金的治学态度所感动，便给丁燕发了一封邮件，欣然答应下来，只是拖到现在才兑现承诺。

其实，我与丁燕只有一面之交，那是 2014 年春，我应邀到内蒙古科技大学做学术讲座，课余时间同丁燕和她的同事们谈论关于科研项目论证、申报的话题，她也对我谈起这部书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写作构想，算是彼此有了最初的印象。她娓娓而谈，娴静、自信又充满朝气，她是要用事实来证明影响和被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正如梵·第根所说：其目的，“是在于刻画出‘经过路线’”，包括说明蒙古族生态文学中的题材、思想、人物等的渊源及其演变过程，勾勒出西方现代文学对它们的影响机制及其途径。而这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如同绣花必须在细微之处用足功的差事，否则肯定会流于泛泛。那时，对她的学术积累、研究能力虽然不甚了解，但她那种义无反顾的坚定，让我油然起敬。我面前的这位青年学者，显然不屑于作照猫画虎的文章，也不急于构筑所谓全新的“话语体系”，而是要从新时期蒙古族作家作品当中追寻可能源自于另一个文学系统，却又已然“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成为艺术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并通过艺术作品再现出来的”（约瑟夫·T·肖，《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即被称作“影响”的东西。而影响通常都是一些“外来性和隐含性”的“难以捉摸而又神秘的机理一样的东西”（P·布吕奈尔，《什么是比较文学》），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由于“这种真正的影响与其说是靠具体有形之物的借取，还不如说是凭借某些国家文学精髓的渗透。”（古斯塔

* 包斯钦，男，蒙古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二级研究员。

夫·朗松,《试论“影响”》)所以,相关研究当然也容不得“大概”“可能”之类模棱两可的推测,而必须用无数个确凿的事实说话,否则作家和读者都不会买账。而现在,当我细读她这部书稿的时候,我分明感到丁燕是有备而来的,她做到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族文学界有个术语的使用频率陡然增升,且热度至今不减,不论在创作领域还是批评领域,吸引着作家、批评家们的广泛关注,这就是“生态文学”。生态文学之所以成为热词,与日益严峻的环境、生态形势密切相关,这表明文学以她特有的敏锐感知到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及事态的严重性,并用她特有的方式发声了。

蒙古民族是生态型的民族,蒙古人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游牧,是世界公认生态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当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他的脐带被埋入洁净的土层之中,人与自然的“契约关系”——责任与义务便确立起来了。从此,他们会尽可能避免对环境的破坏,连多埋一根桩子都不忍心,他们会说:“boligaqi, gazar sevtegeqigene”(蒙古语:“不要,会伤害了大地”)。以四海为家的蒙古人拆了蒙古包装上勒勒车,行将离开旧营盘之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清理生产生活垃圾,平整修复给地表留下的扰动痕迹。一场雨过,一切恢复自然,仿佛这里从来就没有人类活动过。这几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祖辈传下来的法规、习俗、伦理道德,都这样要求他们,使一代代游牧人恪守着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本性,而这已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滋生在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土壤上的蒙古族文学,当然也会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根本价值取向之一。从古老的祝赞词、英雄史诗到《蒙古秘史》,人从不以环境、自然的霸主自居,而是把自己当做自然万物之中的平等一分子,从不妄言控制自然、改造自然。蒙古人倡导俭约朴素、适度索取、永续利用的生活理念,却不去刻意标榜这是一种美德,因为他们觉得本该如此。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大潮的迅猛推进和人类对自然的所谓征服、控制、改造乃至掠夺、摧残的日渐加剧,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接踵而至,迫使人类不得不认真审视和检讨以往的生存观、自然观及行为方式了。自古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著称的草原,在这巨大危机面前充分暴露出其异常脆弱的一面来,草原沙化、河水断流、连年干旱、沙尘暴肆虐……“生态危机”绝非只是“狼来了”的戏言,狼真的来了。生长在

草原本土的蒙古族作家是近几十年来生态环境恶化过程的亲历者和目睹者，恶化的速度与强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于是，他们试图以作家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反映生态问题，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并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学的主要伦理取向。这种文学决不以工具化的态度和工具化的方法对待自然，不是把自然物当作文学表达的工具、途径、手段、符号，而是把文学的锋芒直接对准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和以满足这种欲望为目的的社会发展模式，拷问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并以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终极目标。这种文学被研究者称为“生态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蒙古族文学当中占有显著地位。那么，蒙古族作家们的生态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有没有事实关联呢？如果有，这种关联是如何生成的？研究者能不能追本溯源，用逻辑的和发生学的方法追踪蒙古族生态文学的发生和转化过程，并用学术语言来描述之？

这就是《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的影响》（以下简称《影响》）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和目标。《影响》综合运用“影响关系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等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同时借鉴主题学方法、母题学方法、叙事学方法等研究方法的成功经验，以西方现代文学与蒙古族生态文学的“事实关联”为依据，从“文学性”出发，系统地比较研究蒙古族生态作家对西方作家作品的写作风格、思想内涵、文学意象、人物形象、叙事手法等文学要素的借鉴、吸收和转化过程，以此作为揭示蒙古族生态文学发生、发展契机与机理的一个重要环节。诚然，蒙古族生态文学像所有文学一样，都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其发展不只是民族文学内部的继承性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当前背景下，任何民族的文学都不可能拥有与世隔绝的封闭空间，也不可能拥有不受任何外在文学思潮的浸染而存在和前行的可能。因此，把本土的作家作品置于更广阔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之下予以审视和考察，不但要描述其已然状貌，还要探询其何以为然，毫无疑问这是文学研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以蒙古族文学本体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学发展的时间维度进行纵向研究，这类成果显然大量存在。这对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引导创作和接受活动的健康发展，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缺乏的研究是他国文学对蒙古族文学有哪些影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影响带来了哪些变化，未

来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文学史上的不少新生事物，抑或是固有事物的突然转向、转型，往往是由于异国异族文学的影响而发生的，不去考察不同文学体系之间的交往交流，就无法解释一些现象、一些转向或转型之所以发生的内外在条件与机制。

《影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作家作品，同西方现代作家作品相比较，从生态主题的异同、生态意象、生态母题的演变、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手法和叙事策略的运用等多个角度进行对比，也有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比较研究首先要基于“可比较性”，没有“可比较性”，一切无从谈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郭雪波的《大漠魂》，不论其敬畏自然、硬汉气概等精神层面的相通之处，还是大漠与大海、“巨大的鱼骨架”与“老鹰坨子上的红糜地”等物质层面的具象事物，抑或是老渔夫圣地亚哥和老萨满双阳这两个人物，都为比较、对比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然而，“可比较性”的存在，只能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或类似性，而不能由此断言影响的存在与否。确定影响的存在，就要有“事实关联”的确凿证据。郭雪波对海明威及其笔下“硬汉形象”的推崇，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对西顿的褒赞有加，海勒根那对鲁尔福、博尔赫斯们的“脱帽致敬”……都是对“事实关联”的存在提供了初步线索，使接下来的比较成为可能。但要让现存的“可能”变为读者认可、接受的事实，让假说变成论断，却要经过艰苦细致的求证、研究过程。影响未必是一对一、一站式发生的，事实上影响往往是一个曲折、间接、潜移默化的过程，所谓事实关联，也不一定就一目了然，更可能是一种迷离徜仿、若隐若现的存在。影响对于任何成功的作家而言，必定是经过借鉴转化、杂糅并蓄之后最终变为“自己的”，其作品必定是个性印迹清晰可见而影响遗痕却被淡化了的。比如影响阿尔泰的国内外诗人有达·纳楚克道尔基、巴·雅布胡朗、普希金、惠特曼、米沃什、帕斯、艾青、闻捷等许许多多。普希金受到济慈、拜伦、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积极影响，而阿尔泰受济兹的影响或许是以普希金为中介。宝音贺希格曾经撰文介绍苏格兰诗人卡洛尔·安·达菲的《天才》和《情人节》两首诗，并将后者与波兰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的《洋葱》进行比较，继而又以洋葱为意象创作了《洋葱一样的北京》。他的《在月亮喉咙和太阳尾巴上的坟墓》的标题，显然来自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诗集》中的经典诗句。宝音贺希格的《猎人已死》的题材和主题与劳伦斯的《傍晚的牝鹿》相

一致，但是两位诗人的写作手法和处理方式却大相径庭。凡此种种，说明丁燕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文学阐释注定不会轻松，她不仅需要一双慧眼，更需要事析秋毫、一丝不苟的精神。

《影响》研究的文本不限于某一类体裁、题材或表现手法，以小说、诗歌两大门类为主，从相对传统的写实主义小说到魔幻现实主义、荒诞小说，从较早流行的自由诗、抒情诗到稍后出现的现代色彩浓重的“朦胧诗”“意象诗”，都在讨论研究之列；从海明威、西顿、马尔克斯、华兹华斯到济兹和劳伦斯……都成为潜在的影响源头，成为比较、对比的一方。虽然，《影响》是以新时期蒙古族作家作品与西方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来设计布阵的，但作者所要观照的作家作品，并不限于新时期。如把20世纪30~60年代著名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早期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是在寻找蒙古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原点和现代生态文学的发生原点。事实上，丁燕比较、对比的对象并不限于蒙古族汉语作家作品和西方文学二元，在对上述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时，常常还要讨论相关蒙古语作家的母语作品和中国汉语文学中的关联现象，目的不外乎在于给自己的论述提供丰富的参照，包括文化历史的和当下文学的，从而使《影响》的内容得以丰富和拓展，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厚重感。这种举目千里、山包海容的书写，我们从《魔幻现实主义对海勒根那的影响》一章可见一斑。本章除了译介、影响、研究等其他各章都有的通常交代之外，还有约二十余个子节，内容包括影响和被影响双方的宗教文化、文学传统的比较，包括审美旨趣、叙事模式、结构方式、价值取向的异同分析。作者有了这种全方位的观照和把握之后，进而对作品的意象、象征、指涉、神话原型及其文化根脉、价值取向等，逐一进行循次而进、层层深入的分析论述，为其研究对象描摹了一幅幅全息图。丁燕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自然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她更需要稳稳站立在蒙古高原上，因为她的研究不应成为诞生于书斋、藏身于书斋的“象牙之塔”，而应该为进行中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带来某种启迪、某种推动。所以，在重视事实关系的同时，当然要更加重视价值评析。

正如亨利·雷马克所担心的那样，影响研究如果仅限于找出和证明某种影响的存在，却忽略了更重要的艺术理解和评价的问题，那么对于文学的实质性贡献可能就有限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在重视事实关系的同时，更加重视价值关系，更能够综观全局，更具有评论精神，这当然是比较文学研究

的理想境界。丁燕的比较研究，显然是朝着这个目标发力的。她的研究不同于目前国内常见的生态文学研究，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样，将作家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作品所体现的生态思想作为比较、阐发的重点，而往往忽略了文学性的要素。《影响》关注更多的是作品的形象性、想象性和审美性，作者花费气力更多的不是对作家人生态度和生态思想的比照，而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学语言的表达、叙事或抒情的策略与技巧等使文学成为文学的诸种因素之上，对它们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并尽可能地从文学性的视角“刻画出”影响和转化的“经过路线”。

丁燕的比较研究应该说做得很细。一是正如上述，她不满足与一对一的直观对比，常常拿一部作品同中国和西方文学的多个作家的多部作品相比较，从而使比较建立在丰富的事实材料基础之上，少有生拉硬扯之处。这得益于她对影响关系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两种方法的综合应运，从而弥补了影响研究过于关注事实材料的考证而常常忽略了对作品文学性的深层分析和价值判断的缺憾，同时也避免了平行研究缺少事实关联，容易导致牵强附会的弊端。二是她的研究称得上是多侧面、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就像 H·勃洛克所说的“更能综观全局”、更具“评论精神”（《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等，自不必说，大至两部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作者不同的人生阅历，小至作品中的具体数字在不同文化、宗教传统中所拥有的不同象征意涵，都是她探询缘由的思考对象。这就使得《影响》的意义超出生态文学这一特定对象和领域，使之更具有“一般文学”或“总体文学”研究的品质。海明威与郭雪波的比较是从寻找影响与被影响的契合点开始，然后侧重于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对待人生与自然的态度、生态伦理价值取向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重心自然在内容层面。而对“老人与孩子”文本结构的分析，则是围绕文学表达层面展开的。“故事”或事件如何变成“情节”，生活素材经过审美转换如何变成艺术符号，一个个孤立的“能指”经过艺术的表达，何以成为指向明确的艺术符号并获得不朽的“所指”功能，这是讨论的重点。

丁燕有着良好的英文修养，可以无障碍阅读和利用英文原版作品和资料，这是她从事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优势。《影响》一书常常引用西方文学作品的原文，从词汇、修辞、情感表达方式等细微之处入手，不放过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任何信息，不仅要细细咀嚼和品味每一处叙写的语意、意象及其文化

内涵,更要发现和把握它们如何转化成为被影响者的审美范式,导致了哪些“形似”或“神似”的结果。这在济慈的《蝈蝈与蟋蟀》与齐·莫日根《蝈蝈之声》之比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先是分析齐·莫日根《蝈蝈之声》与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契合之处,接着笔锋一转,开始深入探讨《蝈蝈之声》与《蝈蝈与蟋蟀》之间的神似之处。比如她写道:

济慈和齐·莫尔根都用丰富的想象力,以虫声鸣唱为主线,在时空的腾挪和延展中歌颂自然生灵的生命和力量。济慈从严冬的夜晚跨越到酷暑的正午,并且在前八行的第三行和第四行,第四行和第五行,第五行和第六行,第六行和第七行,以及第七行和第八行之间使用诗句的跨行连续(enjambment),并以此模仿蝈蝈连续跳跃的动作。随着跨行连续的推进,蝈蝈连续完成三次跳跃,最后隐匿在草丛之中……齐·莫尔根笔下的蝈蝈也在诗人的丰富想象之中出现在不同的时空,从闷热夏夜的“阳台”到风和日丽的“岸边”“草丛”,再到秋日乡野的“牧棚”四周,随后蜷伏在草丛深处避雨。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多次转变,蝈蝈的鸣声和诗人的心情也随之发生改变……从“聒噪”和“长吟”到岸边的“合奏”和“和鸣”,再到“嘹亮地歌吟”,最后停歇在草丛深处,同济慈一样,齐·莫尔根也在时空的变化中歌颂生生不息的大自然,赞美自然生灵永不停歇的鸣唱。所不同的是,齐·莫尔根的蝈蝈在不同的时空分别对应诗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从忧郁彷徨的中年(都市阳台)回到天真烂漫的童年(岸边、草丛),再到历经风雨的青年(牧棚四周、草丛深处)。

这种比较可谓细致入微,一些段落完全可以独立成篇,成为佳作赏析文章,且这类例子书中还有不少。

曾几何时,比较文学研究因其过多着眼于追本溯源的考证而忽视了作品的艺术分析,从而引发一些学者的质疑。假如我们在重视文学联系的实证考据的同时,能够更多地注意和比较作品的审美范式、艺术手法、叙事特点、结构方式等构成文学性的因素,不但要指出它们的异同,更要揭示文本深层的美的机理,那么,这不正是文学批评所应努力的方向吗?

当然,《影响》还不算完美。首先,丁燕所研究的文本大多数是蒙古族作家直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郭雪波的生态小说、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海勒根那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中期作品,都是用汉语创作的作品。第二类是从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作品,如阿尔泰、齐·莫尔根、纳·赛音朝克图和

宝音贺西格等诗人的作品。而蒙古族文学的主体部分，最“原汁原味”的部分，无疑是蒙古族作家的母语创作，无论其量的规模还是民族特征、艺术特色、美学韵味，都更值得关注和研究，其中可归入生态文学范畴的作家作品、更具生态文学典型性的书写大量存在。而《影响》并未将它们纳入研究视野，实属遗憾。我还不清楚丁燕的蒙古语程度如何，如有可能，希望她在今后的研究中以蒙古语生态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继续开展研究，并将比较的范围扩展至俄罗斯、日本等外国文学领域，当会有更多收获。第二，《影响》选择的作家、作品还是少了一点，研究的角度也微观了一点。虽然这有助于作者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但对于描绘一个时代的文学运动状貌、探索其发展规律而言，为数不多的个案毕竟不足以说明问题。倘若《影响》能对蒙古文学的整体状貌、氛围进行更加宏观的考察和把握，并从文学内在的变革动力、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和世界性的文学交流等多重视角，对蒙古文学整体样态进行一番考察和描述，也许她的研究会拥有更坚实的基础，对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会更大。

但这些遗憾不会遮挡《影响》的光华。《影响》对不同国别生态文学之间的影响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在文学坐标系的横轴线上标定了一个个清晰的点，这不仅有助于加深文学界对蒙古族生态文学现状的了解和认识，也有利于蒙古族生态文学的纵深发展。其次，《影响》不但凸显了蒙古族生态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也为开拓我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一次鲜活的实践经验，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第三，《影响》对蒙古族优秀生态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和阐释，有利于弘扬、传播蒙古民族特色鲜明的生态文明理念，对建构人与自然的良性和谐关系，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信丁燕的《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的影响》一定会受到业界和读者的青睐。

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2017年3月

前 言

蒙古族生态文学像所有文学一样都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其发展不仅是民族文学内部的继承性发展，同时也受到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本书以西方现代文学与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的“事实关联”为依据，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文本，从生态主题的异同、生态母题的演变、人物塑造的多样性、生态意象的分类和叙事策略的异同等方面系统地研究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的影响。本书的论述将通过以下七个章节展开，前面冠以绪论，后面缀以结语。主体部分的内容分别是海明威对郭雪波的影响、西顿动物小说对黑鹤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对海勒根那的影响、惠特曼对阿古拉泰的影响、济慈对阿尔泰和齐·莫尔根的影响、华兹华斯对纳·赛音朝克图的影响，以及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以下简称劳伦斯）对波·宝音贺西格的影响。

绪论包括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两部分内容。其一，对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数次模仿、移植外来文学现象的回顾为认识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接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提供了基础与借鉴。其二，梳理国内蒙古族生态文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对象和方法——以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影响关系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揭示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借鉴和转化。

第一章为海明威对郭雪波小说的影响。首先，该章梳理了海明威的中译本、蒙译本及国内的影响与研究，并结合蒙古族英雄崇拜文化和蒙古族“韧性硬汉”形象等相似的文学旨趣和精神气质说明郭雪波对“海明威式硬汉”和其他写作经验的接受契机。其次，郭雪波同海明威都在自然景色的艺术表现中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大自然的双重性；两位作家还在万物有灵论、众生平等观、因果报应说等宗教思想所蕴含的生态伦理关怀中寻找生态危机的救赎之路。再次，受到圣地亚哥硬汉形象的影响，郭雪波早期作品中的生态守护者具有复杂的自然观，既有对自然生命的热爱，也有与自然之间的对立。随着写作风格和

生态思想的日臻成熟，郭雪波逐渐摆脱模仿痕迹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将个体反击命运而与自然形成对抗的“悲剧精神”转化为弱小生态守护者与强大生态破坏者之间的抗衡，以及生态破坏者与自然的对立。接下来，郭雪波通过借鉴《老人与海》中“老人与孩子”的文本结构寄希望于年轻人继承前辈的奋斗精神和生态思想，进而成为新一代生态守护者。最后，海明威的性属观和生态女性意识也对郭雪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受到海明威的影响，郭雪波把拒绝“女色”诱惑的控制力和意志力视作生态硬汉的重要内在品质，继而在“不近女色”的生态硬汉基础上衍生出“贪恋女色”的生态破坏者形象和“关爱女性”的外来者形象。此外，郭雪波和海明威的作品中的怀孕意象和动物意象都与女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郭雪波将科尔沁草原传说和萨满宗教文化的生态理念贯穿于作品之中，为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增添了神秘色彩；最后，两位作家都通过强调大自然是女性力量源泉的避难所和男性在自然中得到自我认定和救赎等写作策略寻求两性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

第二章为西顿动物小说对黑鹤的影响。“动物小说之父”西顿在创作态度、写作风格和创作主题等方面对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影响推动了我国动物写实文学的发展。首先，西顿和黑鹤的动物故事都建立在对动物的切身观察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创作而成；两位作家均放弃全知叙述者的视角，按照动物的特征规范描写动物角色的行为和内心世界。其次，黑鹤同西顿一样透过儿童视角、以儿童的独特感受和思维方式呈现儿童与自然诗意相处的和谐画面，以此唤醒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以及对生命价值的崇敬与欣赏。此外，两位作家还将儿童反抗成人世界的母题植入动物写实文学，然而反叛主题却并非黑鹤的写作目的，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矛盾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变为动物保护者和虐待动物者之间的矛盾，从而起到深化生态主题的作用。再次，黑鹤和西顿都表达了对荒野和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焦虑和眷恋，较之西顿微妙的象征性表达，黑鹤对“消逝的荒野”的复述记录更加直接、具体，荒野已经超越了实体上的自然，而被指代游牧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草原精神文化价值观。最后，黑鹤和西顿都在野生动物与人的冲突中凸显富有卓越的生存能力和“英雄气概”的野生动物，所不同的是，黑鹤的作品多以狩猎者的悔悟和反省结尾，“弃猎”母题在生态伦理意义上具有警示和戒恶的功能。与之相对应，人与动物的和谐互惠表现在驯养动物帮助人类摆脱自然困境、恶人侵扰和

野生动物袭击三类情节模式上。不同于西顿,黑鹤在第三类情节中有夸大“舍命救主”的倾向,并在三类模式中凸显游牧狩猎民族与动物和谐共存的生态价值观。

第三章为魔幻现实主义对海勒根那的影响。该章内容主要从圆形叙事、变形技巧、文学意象和神话原型四个方面详细论述海勒根那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借鉴和转化。首先,笔者概括了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和相关研究,以及魔幻现实主义与蒙古族文学结缘的重要条件。其次,该章论述了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在环形时间观和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螺旋式环形结构、空间循环模式和生命循环模式等魔幻现实主义圆形叙事结构,以此表达作者的生态关怀。再次,海勒根那通过博尔赫斯和余华间接受到卡夫卡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对变形技巧的学习和借鉴,如变形的外在原因、文化根源、生存空间、内在联系等。此外,福克纳和博尔赫斯对数字的艺术表现和鲁尔福作品中的雨、水、鬼魂意象均被海勒根那所吸收并转化成自己的独特写作风格。海勒根那充分调动魔幻文学意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民族思维特征,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渲染人物性格的塑造,并深化作品的生态主题。最后,海勒根那同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一样在创作中通过改写仿拟和重述图腾神话、洪水神话传说表达了对人类生存境况的认知,显示出深刻的生态人文关怀。

第四章为惠特曼对阿古拉泰的影响。该章内容论述了阿古拉泰受到惠特曼《草叶集》的启发和影响,其诗集《青草灯盏》不仅歌颂了“草”意象所蕴含的“跃动的生命本体”和“顽强的生命意志”,诗人还将坚强和拼搏的草木精神与时代的精神实质相联系,作为激励民族奋发图强、振兴祖国的精神动力,并将“草叶”的丰富内涵扩展至对草原生态环境的治理和草原传统文化的传承。

第五章为济慈对阿尔泰和齐·莫尔根的影响。首先,该章论证了阿尔泰从普希金的诗歌中汲取营养,并间接受到济慈的影响。济慈、普希金和阿尔泰三位诗人都在以秋天为题材的诗歌中应用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生动地展现了大自然的画面美、音乐美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美;不同的是,前两者使用听觉意象的冲突表达了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否定,阿尔泰则在不同的色彩意象中巧妙地传递出自己对游牧生活和农耕经济的态度,并通过缩减诗行和巧用标点符号等写作技巧表达了对草原游牧生活的怀念,对草原垦殖的质疑,以

及对草原沙漠化的担忧和感慨。其次，该章内容还探讨了济慈对齐·莫尔根的影响。济慈和齐·莫尔根都应用丰富的想象力，以虫声鸣唱为主线，在时空的腾挪和延展中歌颂自然生命。不同的是，从夏到冬，昆虫的鸣唱倾注了济慈对自然的热爱之情，也表现了人之生死如季节交替的生死观念；不同时空的蛐蛐在莫尔根的作品中则对应着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人生经历，并由此表达了诗人对游牧生活的眷恋和对城市文明的批判。

第六章为华兹华斯对纳·赛音朝克图的影响。该章论证了纳·赛音朝克图的早期创作受到华兹华斯的影响。《拣牛粪的姑娘》和《孤独的割麦女》都使用了自由流畅的叙述诗体和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呈现出一幅女性之美与自然之美的和谐画面；不仅如此，赛音朝克图还将蒙古族生活场景、传统审美观和价值观融入其中，塑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积极乐观的女性形象。

第七章为劳伦斯对波·宝音贺希格的影响。该章以《猎人已死》与《傍晚的牝鹿》为比较文本，探讨了波·宝音贺希格与劳伦斯的影响关系。两位诗人都以“鹿”为主要诗歌意象，巧妙地将人与鹿的互视作为全诗的转折点，并在人与鹿的互融中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回到人类和动物的和谐生态关系。不同的是，劳伦斯将两性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融合在一起，而宝音贺希格则以死亡的方式将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化为人与自然的融合。

结语总结了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不同层面（形式、技法和内容）的影响和不同形式（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概括了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的成就及不足。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蒙古族生态文学只有高扬民族精神，吸收世界文学的精髓，才能走向世界，与西方文学形成平等互利的双向交流。

关于本书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待于说明。“魔幻现实主义对海勒根那的影响”以海勒根那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多部小说为研究文本，重点探索卡夫卡、福克纳、鲁尔福和马尔克斯等作家在魔幻意象、叙事手法、变形艺术、神话原型等方面对海勒根那的重要影响。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虑到研究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本书比较研究的内容不仅涵盖了具有魔幻现实主义写作特色的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还有部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及作品。魔幻现实主义对当代蒙古族作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笔者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继续拓展研究范畴和研究主题，以蒙古族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魔幻母题的演变、

魔幻意象的分类、叙事策略的多样性等方面探索蒙古族当代小说与魔幻现实主义在对话与交流过程中的变异和创造性意义的产生，从而进一步分析当代蒙古族小说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独特性和民族性。

笔者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促进蒙古族比较文学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为增进文学界对蒙古族生态文学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的了解与认同，为推进我国永续和谐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丁 燕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6年11月